

整整一條利東街（五部曲）
2005-2009

投訴博物館
2010

香港佔領運動考現
進行中

2014



民間博物館計畫

《整整一條利東街》計畫中，以攝影拼接出利東街的立面全景。

2002年於香港成立的民間博物館計畫，曾策動一系列「街道博物館」計畫，對日常生活的型態、傳統和價值進行盤點，並以「呈視社區」的手法與持着「文化拾遺」的理念，在不同社群環境中進行研究、展覽、出版，提供討論平台，並進而發現潛在，及至未來的設計創新。

《整整一條利東街》呈現人與環境在城市變遷或士紳化下的面貌和故事，韓國安養公共藝術節的「投訴博物館」則展示體現市民參與和政治表態的項目。

《香港佔領運動考現》則是一項以捕捉近期為爭取香港真普選所發動的佔中「雨傘運動」裡，關於公民的創意行為和空間營造為目標的研究，此計畫同時也在思索如何可長遠建立民間主導、獨立的物件庫存及研究力量。



《香港佔領運動考現》，高雄駁二藝術特區展覽現場，2014。攝影：謝柏齊。

博物館作為方法： 談香港「民間博物館計畫」的方法學

「民間博物館計畫」是香港的非營利文化組織，2002年由一群策展人、設計教育人員、文化研究者、社會工作者成立，¹其英文標題為Community Museum Project，「民間」（Community）、「博物館」（Museum）、「計畫」（Project）此三個字詞以一般認知來說是彼此相互矛盾：博物館通常收藏與處理「精英」文化，它與「民間」的常民文化站在對立面；「博物館」為一永久性文化機構，而「計畫」則是有彈性的，具暫時性與變動性特質；「民間」是多元的自然生成，但「計畫」具有規畫、按部就班的意義。此詞組自身成為一個問題意識：在此矛盾之中，「民間博物館計畫」如何定位自己？此「博物館」又如何不同於一般的博物館概念？若以他們的說法：「以博物館作為方法」，此方法學的優缺點為何？再者「民間博物館計畫」與香港社會現實之間的關係為何？我認為「民間」，「博物館」，「計畫」這三個詞語既是問題意識，同時也可以用來說明「民間博物館計畫」的目標、方法與內容，並開展以上的疑惑。

「民間」、「博物館」、「計畫」？

「民間」是社區居民、一般大眾、也是廣東話的「街坊」，此一詞統整「社區」、「社群」概念，既可避開特定地區或對象上的限制，又可涵納生活美學、民俗工藝與在地智慧等。民間的力量在於街頭巷尾的日常瑣事裡，俗民生活之中有許多待挖掘的寶物。「民間」也有「公共」（public）的意義，香港的公共空間一向不足夠，也長期被控管，現有的公共生活又在如火如荼進行的市區重建（都市更新）被損毀。拆除／重建，抹平／再植入的單一路徑裡，香港人發覺「未來」不知在何處，但僅有的「過去」又不斷被除去，不僅是生活方式、空間，還有記憶、情感皆被拔除。「民間」也與「本土」相關，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之後，政治上「一國」高於「兩制」，在經濟上轉型為金融與觀光城市，這些與中國過度緊密的聯結對日常生活產生

嚴重影響，也讓香港對中國的複雜焦慮感逐漸加劇，香港認同正是這種焦慮的體現。認同的產生／生產正是通過對自我的認識，是由「我」到「我們」的過程，「民間」正是這個集體的「我們」的具體呈現。

「博物館」在此既作為名詞，也是動詞。作為名詞的「博物館」是一種挪用，借用傳統意義的博物館框架，是一價值之物的收集保存之地，意義的生產之處所，既建構知識、書寫歷史，也具有成人倫、助教化之功能。但是，此「博物館」不侷限於傳統的有形建築之內，也不是一永久性機構，而是將「博物館」當成一種比喻，把「民間」作為此博物館的範疇，街道即是博物館，社區就是活生生的博物館，作為一種「反」充滿死物的博物館，作為一種對既有機制的批判。「博物館」的另一個更重要的意義是作為動詞使用，以博物館作為具體的行動方法。這裡並非將日常生活使之博物館化，將動態街道濃縮在所遺留的物件之間。相反地，「民間博物館計畫」以博物館作為方法：搜集（文化拾遺）、研究（視覺盤點）、策展（社會資源策畫）、呈現（社區視覺化）、展示（展覽／參與設計）、教育（溝通／詮釋）等，²使那些「將死的」社區街道，或即將消失的民間技藝，或將隱晦的社會現實放置於投射燈之下使之可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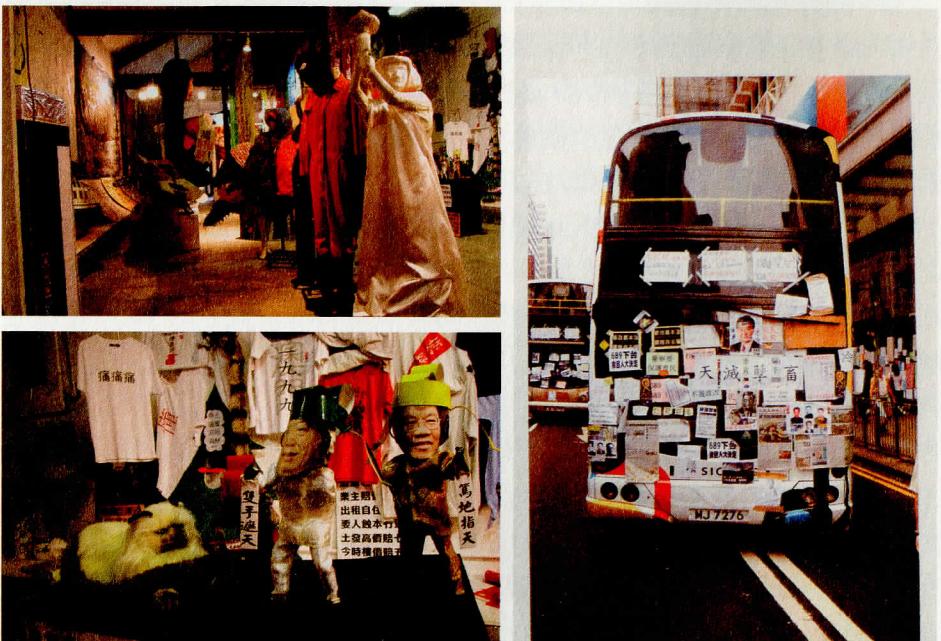
「計畫」明確指出「民間博物館計畫」不是一個硬體建築、常設機構或永久性展覽，它是一個以「提案／方案／建議」（proposal）為基礎的工作模式，以地點、事件、脈絡、人等為問題意識，以研究為基底，並具有靈活、機動、開放、生產性，指向行動的可能。「計畫」也指向它的「策展」特質，但在此「策展」超越博物館內舊有的策展工作職責，進而對既有現狀的檢視、重新布署、配對、呈現議題、資源匯整、網絡聯結、推進創新，甚至促成現實之改變。

綜合言之，「民間博物館計畫」以民間為對象、範疇與主題，以博物館作為方法，打破精英主義，歌頌地道的常識、民間智慧、生活創意，對既有機制進行批判，也重新思考與創造新的系統，以計畫為動態與靈活回應社會現實的可能。以下由三個案子來說明「民間博物館計畫」如何以博物館作為方法，同時也檢視其方法學的缺憾之處。

展示行動／運動

2002年的「示威遊／尤物：一個看我們如何表態的展覽」³是「民間博物館計畫」的第一個計畫，可視為勾勒其方法的雛形：質疑博物館的收藏概念、肯定民間創意，以及用視覺文化作為呈現。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後，街頭抗爭越來越頻繁，示威的標語、旗幟、道具、物件等為示威增添力量，這個展覽收集百餘件示威遊／尤物公開展示。此展覽質疑收藏與展示的既有概念，提問：什麼是有展出價值的？這些具有明確工具性之物件，在行動中有其特殊效用，然而在行動之後它們如何被看待？它們是無用的垃圾，亦或時代的見證者？運動／行動與展示之間可以有什麼對話關係？

若說「示威的重點在於：展示訴求，或人民的威力」⁴，示威與展示在此有相似之處，示威是展示訴求，這個展覽是展示示威，也視覺化行動，展現「如何表態」。這個展覽處理從現場到展場的問題，這些不知名的「物件／



左：「示威遊／尤物：一個看我們如何表態的展覽」，1a Space 展覽現場，2002。

右：《香港佔領運動考現》，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顧明均展覽廳現場，2014。

作品」是這個展覽的主角，雖然這些物件「具有承載歷史、製造集體認同，以及肯定參與者在行動中付出的努力」⁵的價值，但是由動態到靜態，從行動到物件，到底什麼東西被保留，什麼喪失？物件自身可以訴說多少現場當下的故事？2014年台港兩地的「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革命」相繼發生，如何看待、處理與記錄行動／運動的議題又起，「民間博物館計畫」在十多年前已思考社會運動的展示意義，以及如何展示的問題。

「文化拾遺」、「視覺盤點」、「呈現社區」

《整整一條利東街》是「民間博物館計畫」花費最長的時間（2005–2009年），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計畫，記錄位於香港島灣仔的一條喜帖印刷街消失的過程與樣貌，抵抗發展主義主導的市區重建。這個計畫同時也讓「民間博物館計畫」的方法學漸趨完善，包括「文化拾遺」、「視覺盤點」、「呈現社區」⁶。

2005年起利東街面臨市區重建的迫遷，居民發起抗爭，要求政府做到「以人為本」的市區重建，爭取「樓換樓，鋪換鋪」的留駐現場。諸多支持抗爭行動當中，「民間博物館計畫」為其中一員，但他們不是站在抗爭運動前線高聲吶喊，而是以參與、陪伴、記錄運動當下的地景，為即將消逝的街景、社群與產業留下視覺圖像與人文故事，從事「文化拾遺」之工作。若以「文化拾遺」為思考點，在此「文化」為何？有哪些東西需要拾遺？拾回來之後如何運用這些文化遺物？這些問題環繞著這個計畫。此計畫剛開始的想法很單純，想要以兩張長形的利東街街道圖作為紀錄，因此他們開始為每一個店舖樓房的正面進行拍攝工作，再將拍攝的四百多張圖片透過調色、改換透視、拼貼、結構在一起，完成一個六公尺長的利東街全景圖。然而，在工作過程中，每個店舖的空間配置、居民的故事、彼此街坊的關係，以及香港印刷業的興衰史漸漸浮現。「街道」在此成為「民間博物館計畫」的「民間」的意義所在，一個社區，一個有機生態聚落，也是這個「博物館」要處理的對象與範疇，「文化拾遺」收集的不僅是具有物質性特質的物件，也就是蕭競聰所說：收集「不能收集的」⁷，搜羅非物質文化，收藏整整一條利東街。

呈現利東街故事的方法是「視覺盤點」，除了店舖正面之外，鐵閘、信箱、門鈴、大幅橫匾、街頭告示、搬遷啟示、治安警告等相關物件逐一拍攝成獨立影像，避免影像風格化或加入美學修飾，以保有紀錄的客觀性，再將這些影像並置、比對、排列，成為一系列視覺符號，將消逝的保存，將遺跡轉為故事，將單一不起眼的日常景象變成影像檔案。這些研究紀錄被展示在附近的灣仔集成中心商場，也由利東街居民來做導覽，說自己的故事。

「展覽」在此地的重點不是一般概念下的展覽，它以視覺影像「呈現社區」（visualizing community），讓社區被看見、被討論、被記住，也透過這個公開展示的機會成為一個聯結地區社區居民、商家、社會資源的平台，成為營造社群，持續滾動與延展議題的方法。

《整整一條利東街》以視覺化方法也讓利東街被看見，引起話題，促進行動，然而我認為此計畫的方法有待商議，它所達到的效果正與「民間博物館計畫」的概念相違背。利東街是一條即將死去的街道，在它邁向死亡的路途上，「民間博物館計畫」扮演具殯葬特質的送行者角色，以視覺化的「遺照」檔案為方法，利東街被博物館化，「博物館」成為利東街的現實。此計畫中為保持客觀的「視覺盤點」正是盡其所能的清晰指認原有物件的每個細節，數十載的動態生命扁平化成為2D影像，似乎他們過去的一生並不重要，只有在按下快門的這一瞬間他們的生命才將被記憶，這是一種「去歷史」的態度，傾向簡單化、表面化、形式化。尤其以「去風格」的類客觀攝影來「再現」複雜的現實，這種過度的明確影像反而壓縮想像空間，抹平街道的



《整整一條利東街》在
百貨公司展覽，由當地
街坊導覽作品。

其他感官經驗，例如混雜的氣味、喧鬧、光影、街道氣質等，另外，以影像輸出為展現方式，失去真實物件的質感以及他們可能承載的靈光（aura）。以上這些讓原是具備 off-site 特質的利東街被收納為一可在室內展出的平面影像，展出時僅作為與事件發生現場對照的證據，也就是僅僅作為美國地景藝術家羅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所創造一組詞彙「Site/Non-Site」⁸（「場域／非場域」）。

社會策展

2006 年的《小作業大智慧——訪尋深水埗手工業者》處理的地點是另一個面臨強力都市更新的老舊社區深水埗，不同於「整整一條利東街」，這個計畫是一個「活化」，而非標本式「死化」社區。「找師傅跟我們一起 jam」⁹ 是這個計畫中的重點，他們先研究街區內「師傅」的技術、店鋪及其產業，先請師傅們各自示範自家的手作工藝，再找來設計師與「師傅」共同合作，將相關的材料重新組裝，成為新的產品，例如把木頭車變為活動桌子、白鐵箱子變成相機、花牌師傅教學做小花牌等。透過八個跨世代合作的案例，發揮集體創意，結合民間工藝與當代設計，舊與新結合，給予不同的意義。

此計畫透過「互 jam」方法提出幾個議題。首先，透過這些合作揭示平日被大家忽略的無形資產，肯定老師傅的價值。這種肯定正是對於過往的「社區」與「創意」概念過於狹隘的質疑。謝柏齊提到香港對於「社區」概念的轉變：從 1980 年代到 2004 年左右，一般認為社區是有問題的，應該要被淘汰，這是個「問題化論述」概念，在此概念之下推土機式的市區重建被視為理所當然之事。2004 年之後，社區有另種論述，它被視為完好的，有價值的，這種「欣賞式論述」讓人們重新看待與思考「社區為何？」。¹⁰ 陳沛浩在 TED × Seoul 的影片中所談到：「政府只看人民缺什麼，我們看已經有什麼，像是半杯水，他們看見半杯的空，我們看見半杯的滿，用創意再創造更多。」¹¹ 或是他於其他訪談中所說：「當人們把社區與藝術扣連在一起時，首先想到的是在公共地方掛上大壁畫，彷彿這便可以提昇市民大眾的層次。但我們卻相信：人在日常生活中處處充滿創意……在於你如何組織所見到的

事物和會否尋找背後的意義」。¹² 「小作業大智慧」計畫重新看待社區價值，認為社區之中有豐富的民間智慧、在地知識、傳統技藝，這些皆是無所不在的創意，重點在於有沒有被看見，有沒有被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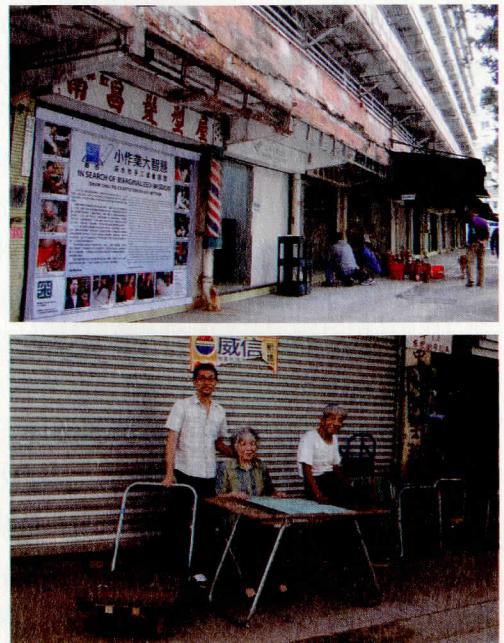
這個計畫的另一個重點在於社區資源的開拓。香港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傳統社區手工產業日益凋零，同時也因市區重毀壞的社區生態，造成原有社區經濟系統的崩解，因此思考如何透過整體系統的整合創新來改變現狀是此一計畫的考量。「小作業大智慧」計畫透過師傅與設計師之間的合作，不僅確保這些在地智慧、技藝與故事的存留，讓他們在新時代裡有新生命，並且可以實際的創新商機，將「無形資產化作其中一種經濟動力」¹³，為受影響的居民們尋求出路，尋求永續發展的新方向。這個概念也是「民間博物館計畫」所標榜的「社會策展」（social curating）¹⁴，身為社會策展人擔任中介角色、媒介者，在此計畫裡是「媒婆」，收集那些社區既有的資源、價值、智慧與物件，動員社區資源，並撮合不同社群進行交流、交換、分享，展現這些隱藏於社會現實之中的知識，締造具創意的社會關係。

2013 年「民間博物館計畫」團隊來到高雄旗津，執行「旗津駐留」。此計畫採用「小作業大智慧」的概念，他們與在地團隊合作的工作坊，促成



《小作業大智慧——深水埗手工匠圖譜》對於工匠製作流程的記錄及解說。

上：「小作業大智慧——深水埗手工業者展覽」，
於石硶邨尾一組舊式公寓展覽現場，2007。
下：產品設計師李宇軒和友記車行的師傅合作，
利用師傅的數十年經驗，設計出一款結合推
車和木桌功能的可活動木桌。



「旗津民間博物館」之成立。「旗津駐留」計畫找出四個特殊的當地產業：烏魚子小販、螺旋槳工廠、漁網製作、凸繡技藝。透過研究調查、訪談、拍攝記錄，再將這些不起眼或平時不為人知的產業使之「視覺化」，製作出四張大型海報訴說這些產業的故事。例如，販賣烏魚子的小販，海報上曬烏魚子的場景位於中間，四周環繞著：烏魚子的生態、如何製作烏魚子、販賣烏魚子的老闆夫妻、烏魚子食譜四個區塊。另一張海報為製作螺旋槳的工廠，中間為巨大的車葉螺旋槳樣貌，旁邊因為螺旋槳的形狀而分為三個區塊：製作螺旋槳的四人團隊、製作工法、裝配螺旋槳的過程。這些海報既是當地產業的微歷史，也是這個產業周邊的聯結網絡，是一在地產業的微生態。這些海報與成果在旗津各地日常生活空間張貼展出，成為在地風貌的一部分。

off-site 作為方法

以上三個案例可以略略窺見「民間博物館計畫」的方法：用博物館作為方法來觀察與描繪現實社會，以文化人類學式的「在場」為核心，透過觀察記

錄參與，將以「客觀」的角度觀看人事物，將地區、社區、街坊、產業以整體生態學（Ecology）概念來思考，以口述歷史、視覺化方式「厚描」這些具有豐富文化底蘊之處，採集民間創意（indigenous creativity）、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並進行跨世代、跨區域、跨國合作研究，具有積極意義。然而，若要在雞蛋裡挑骨頭，我認為「民間博物館計畫」的自身命名成為一種矛盾，而此種矛盾也影響方法，「民間博物館計畫」其實是針對每個在地文化脈絡而設計，是我所說的 off-site art curating，然而其標榜的「以博物館為方法」反而造成混淆，質疑他們是用博物館的方法從事博物館之外（off-site）之事，那目標到底是要將動態的日常生活靜態化，還是要將日趨沉寂的社區使之活化／回春？是博物館化，還是去博物館，作為一種機構批判？這些議題需要另闢專文再處理。（文／呂佩怡）

- 1 陳沛浩是當代藝術策展人，為香港早期從事藝術行政者，曾在 1a Space 工作；黃小燕的背景是文化人類學、設計、視覺文化；謝柏齊是社會工作者、行動者；蕭競聰是設計領域，並在香港理工大學教書。他們四人之間的跨領域合作正是讓「民間博物館計畫」得以突出。
 - 2 黃小燕在 2014 年 12 月 6 日與 7 日發表於高雄駁二「與社會交往的藝術——香港台灣交流展」座談「Art × Change」改變的藝術。
 - 3 此計畫曾於 2002 年在韓國展出，2004 年到英國曼徹斯特華人藝術中心展出。十年後（2014 年）在倫敦的 V&A 博物館則有一個「抵抗的物件」（Disobedient Objects）特展，展出全球各地示威的文件、物件、標語、創新發明的道具等，香港的雨傘運動便在其中佔據一個角落空間。
 - 4 民間博物館計畫（編），《示威遊／尤物：一個看我們如何表態的展覽》，香港：民間博物館計畫，2004。
 - 5 同上註。
 - 6 蕭競聰，〈呈現社區：文化拾遺與社群營造方法學〉，收錄於《教育與承傳：歷史文化的視角》，梁操雅、羅天佑主編，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11。
- 7 King-Chung Siu, "Street as Museum as Method: Some Thoughts on Museum Inclusivit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Inclusive Museum*, vol. 1, no.3, 2008, p. 59.
- 8 對於 site/non-site 之批判請見呂佩怡，〈Off-Site 藝術初探〉，《現代美術學報》第 22 期（2011.10）：9–38。
- 9 關詠賢，〈通識人物：「民間博物館計劃」與你互動〉，明報，2008 年 5 月 19 日。
- 10 謝柏齊在 2014 年 12 月 6 日與 7 日發表於高雄駁二「與社會交往的藝術——香港台灣交流展」座談「Art × Change 改變的藝術」。
- 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WfJhBL48xc>
- 12 馬傑偉、吳俊雄、呂大樂（編），《香港文化政治》，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9，頁 88。
- 13 民間博物館計畫，〈小作業大考察〉，《小作業 + 大智慧：探尋深水埗手供業者》，香港：民間博物館，2007。
- 14 此詞彙由蕭競聰與陳沛浩提出。King-Chung Siu, "Street as Museum as Method: Some Thoughts on Museum Inclusivity," p. 63.

2004年尾
至2005年中



2006年中
至年尾



2007年9月



2007年尾
至2008年初



2008年尾
至2009年初



利東街不失去一間一間獨立經營的店鋪所組成。「金發阿萬」第二代黃吉昌(照片中，站在金發門口拿着電話的先生)的檔舖，是由「利記」樓梯間老店的朱天輝(站在樓梯門口，穿著藍色上衣的老人)所開的，「利記」的名號，由他的兒子朱子良(站在左方，穿著藍色上衣的青年)繼承。朱子良在利東街工作了二十多年，是利記的忠貞員工，朱天輝沒有食水，「金發」的開業，數十年來都是靠吉慶巧運。數十年間，人在此上，便成了千篇一律僵化的開業場。

在上演戲「此乃市區重建局物業」的大型装置藝術後，這是特別為利東街而設，從重建不拆舊屋的「利記」和「金發」，到賣賣位便士手標的「利記」，這二十年來，利東街的開業場，這些招牌仍舊有其獨特色彩。

工人開始處理地盤，準備圍板清拆老舊牆。一些行動和年輕人把利東街上的標題和廢物活動，都放在利東街的牆面，讓利東街發揮出活力來。

現在利東街圍板下，手執地盤和背上圍板的形像，被美被稱為「利東街女郎」，十五名女郎在聲響內給地盤噴上顏色，畫方框作牆。

利東街已指派美嘉板圍板，地盤內時作隆隆巨響。深夜沙塵，圍板上掛地盤橫幅，為了防止外飛石再次撞上工字鐵門而製。

照片尾段，該種美嘉的女士為利東街的街坊May姐，正在進行地盤抗議，要求政府停止清拆工程。

街頭的地盤女郎會製作地盤郵折，並手持美嘉地盤公司。照片中尾段，地盤內來的的地盤工人多數戴頭盔，警棍力舉止強。

在上演戲「此乃市區重建局物業」的大型裝置藝術後，這是特別為利東街而設，從重建不拆舊屋的「利記」和「金發」，到賣賣位便士手標的「利記」，這二十年來，利東街的開業場，這些招牌仍舊有其獨特色彩。



利東街雙號地下：2004至2009年，民間博物館計畫記錄了利東街商戶被逐步遷離、封鎖，以至整個街道被圈圍，全盤清拆的過程。當中記敘了居民最後街頭行動的訴求，以及官方在地盤圍板上所繪畫的未來景象。圖為由莊士敦道向皇后大道東方向（由北向南）。